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六〇期 ——  
(二〇〇七年三月六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703b)

---

【专题研究】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下篇） 单少杰  
【文革点滴】随卫江青的回忆 郭吉成·杨宇宁  
【一家之言】梁效反对过周总理吗？ 周一良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专题研究】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下篇）

• 单少杰 •

下 篇

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立下字据；让他们言之凿凿地向历史作证，誓言自己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

(1)

杜润生先生曾对笔者说过：毛主席整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求挨整的人必须做检查，不做检查是不行的，是不让过关的。邓子恢做过检查，我做过检查，彭老总也做过检查。

这种向毛泽东交出的“检查”，实质上就是“悔过书”或“认罪书”，就是检查者有文字稿本并在有许多人出席的场合，或是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有时是无中生有地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或是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有时是无缘无辜地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这种“检查”，通常还都要检查到上纲上线的程度，甚或是自羞自辱的程度。

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检查。在这一检查中，周恩来痛责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即性质为“右倾保守”的错误；承认自己在政府工作中“错误地采取了机械和静止的平衡的方法”，存在着“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

他还痛挖自己之所以会犯上述错误的“思想根源”，称之为“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经常表现为“经验主义”，有时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时表现为“两者的混合”。

周恩来这一下子就自己给自己扣了许多顶大帽子，许多顶十分吓人且十分丑陋的大帽子。他这是在自己羞辱自己，并且是当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的面自己羞辱自己。

周恩来这一检查，不只是屈辱性的，还是荒诞性的。这一检查中所要否定的东西，即周恩来力主“反‘冒进’”的东西，却有着骄人的成绩：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既快速又平稳；而这一检查中所要肯定的东西，即毛泽东决意“反‘反冒进’”或曰“大跃进”的东西，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国民经济倒退十年，全国人口饿死数千万。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等人也做了这种屈辱性和荒诞性的检查。

彭德怀在检查中承认：他的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他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犯错误的原因，除了政治思想的右倾以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夹杂有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成见”。他最后表示：“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党的总路线，永远做党的驯服的工具，不管今后党中央的领导人有什么变动，都愿坚决服从领导，在党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并愿尽自己的余生，无限忠诚地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

黄克诚也在检查中承认：“我7月19日的发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发言中的观点与彭德怀同志信中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配合彭德怀同志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攻。”

彭德怀和黄克诚都是刚直之士，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都属“异类”：前者是中共党内“延安整风”后唯一仍敢指着毛泽东鼻子说话的人，并因此而被诬称为“有反骨”的人；后者则被党内同志称做是“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并因此而被批判、被撤职“总不下十来次”。

可这一次在庐山上，前者在指着毛泽东的鼻子说了一通话之后，又打了自己的耳光，并且打得很重很重，将自己打得鼻青眼肿。后者则在非常仗义地讲了许多真话之后，又非常违心地讲了许多假话，顺着那些整人者的意，把“鹿”说成是“马”，把“黑”颠倒为“白”，把明明是正确的意见强说是错误的意见，并且是错得一塌糊涂的意见。

可以说，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最为匮乏的人格类型，莫过于“刚直”了，即彭德怀、黄克诚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直言骨鲠的人格类型。其间绝大多数者，都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的态度，曲意逢迎着这位党老大为所欲为地执掌着、乃至祸害着这个党、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所谓“七大常委”。除毛泽东外，其余六人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六人都无一例外地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态度，尽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一。

除晚年外，刘少奇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都顺从着毛泽东，并常常是违心地顺从着毛泽东，即常常是昧着良知去做着助毛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运动中，在“反冒进”运动中，在“大跃进”运动中，他都曾一度站在较为清醒的一方，即毛泽东称之为“右”的一方；可一旦获悉毛泽东已下了反“右”的决心，便立刻转变立场，变“右”为“左”，顺从着毛泽东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实事或讲了实话的人，去批邓子恢，去批周恩来，去批彭德怀……

更有甚者，他竟能为附和着毛泽东去整彭德怀而干出那种栽赃陷害的事：一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不会说一句外国话”，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德怀“里通外国”；二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一向不爱搞拉拉扯扯，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德怀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军事俱乐部）。可以说，刘少奇是头脑相当清醒地跟着毛泽东去做这些浑事且丑事的。

至于周恩来就离“刚直”更远了。自“延安整风”后，他就一直对毛泽东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屡屡遭毛泽东打压乃至羞辱，又屡屡向毛泽东示弱乃至告饶，甚至屡屡昧着良知做了许多助毛为虐的事。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本应该由他这位当总理的人向毛泽东进言“大跃进”搞得过火事，可他就是隐忍不说，结果让那位当将军的人替他一吐为快。彭德怀为此气得当面骂他：“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于是乎，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因不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经济的国防部长则因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不免落难。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彭德怀替周恩来说话而被打倒后，周恩来不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来指责这个代他受过的人。他一是批彭德怀的现行罪过，即批彭德怀此时猖狂攻击“大跃进”；二是揭彭德怀的历史老底，即揭彭德怀过去就曾屡屡反对毛主席。

1959年8月24日，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报告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听报告者为全军正师职以上干部，计有一千余人。在这一报告中，周恩来以中共最为资深的党人、军人的身份，畅谈中共的党史、军史，历数彭德怀一件件反对毛泽东的事例，从而为毛泽东关于他与彭德怀在历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说法，做了“最权威”的注释，至少看起来像是“最权威”的注释。

不过，周恩来虽然离刚直最远，但也正因此而能在毛泽东治下的仕途上走得最远，至少比刘少奇、邓小平走得远。他屡屡被毛泽东敲打，但都因自己忍让躲闪有方，不仅没被毛泽东敲打得一蹶不振，反而能最终盖着党旗老死于毛泽东的身旁。

林彪虽在穷途末路时敢与毛泽东拔刀相向，作困兽之斗，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场合中，都是无原则地追随着毛泽东、热捧着毛泽东。比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在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都是不论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泽东抬轿子、吹喇叭。

至于朱德，用李锐先生的话说“是一个‘阿弥陀佛’的人，好好先生”。他固然不会去积极主动地整治人，但也不会去仗义执言地抗拒毛，而常常会随着大溜说上一些应景的话、敷衍的话，既敷衍着毛泽东，也敷衍着公道和正义。

陈云曾屡屡为毛泽东补偏救弊，收拾经济烂摊子，故经常被毛泽东誉之为“良将”、“贤妻”。不过，他一旦发现毛泽东反悔变脸，变虚心纳谏为讳疾忌医，并迁怒于自己，便立刻做出检查，痛说自己种种不是，接着就请病假走人，与毛泽东脱离接触，使之眼不见心不烦，也就不予严加惩处了。

至于邓小平，则很善于向毛泽东做检查，即很善于在毛泽东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对了的事硬说成是自己做错了的事，并发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层，无论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质量来说，还是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数量来说，邓小平都属名列前茅者。

毛泽东不只是高高在上地注视着其他人在如何羞辱着做检查者，以及做检查者在如何自己羞辱着自己；有时还忍不住技痒，也亲身下到场子里，趟一趟这羞辱做检查者的浑水，过一过这用伶牙俐齿折损人的口瘾。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子恢先是拒不认错，硬生生地与整人者僵持着，故迟迟不能过关；后来经不住家人劝说而同意由他们代写一份检查交了上去，遂得以过关。

毛泽东则把邓子恢最终扛不住而不得不写检查这件事，拿到大会上评论了一番：“这里面我倒是很佩服邓老。他硬是不检讨，但到最后，也弄了一篇检讨来。我原想会有一个顶到底的。其实他是有自我批评的，比如在北戴河会议。”

毛泽东这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调侃着失败者，面子上是在表扬“邓老”，骨子里则是在奚落邓子恢：你不是很硬气吗？怎么也弄了一篇检讨来呢？我原来以为你是要硬到底的，结果看走了眼，不是那么回事。其实，你这么做也不是第一回了，比如在北戴河会议上，你就有过这个表现了。

毛泽东对邓子恢的这一奚落是相当损人的，先是逼着人家去做违心检讨，后又讥讽人家做了违心检讨。这就好比先是逼着人家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后又嘲弄人家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不大听使唤。

毛泽东善于揣摩人，明明知道邓子恢是一个很为刚直且很知廉耻的人，一定会为自己做违心检讨这件事感到十分羞辱，“他思想痛苦极了，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可又偏偏要当着众人的面，故作惊讶地去挑明此事，还故作惋惜地去打趣此人。人家哪儿疼，他就往哪儿捏，还一边捏着，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着、笑着。

## （2）

人是有可能反悔的，有可能当时认错而日后改口，申明自己先前认错是被逼迫的，是讲违心话，不能算数。

毛泽东不会不清楚这一点，何况他本人就的确做过许多这种逼迫人讲违心话的事，因而会更清楚他所整治的那些人，很有可能当时不得不低头认错乃至认罪，而日后一遇机会就会改口或翻供。

尽管他手里拿着一大摞由挨整者交上来的检查书，但他心里并不很踏实，总有些担心日后这些人会翻供，还有些担心日后其他人会为这些人翻案。也正因此，毛泽东一向对“翻案”的事十分敏感，疑神疑鬼，常常为此勃然大怒，兴师动众地去反击所谓“翻案风”，并再迫使那些

“翻案者”做出检查，以记录在案。

四十年代，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整了许许多多的人，既整了许多像王明、博古这类来自莫斯科的教条主义者，也整了许多像周恩来、陈毅这类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党中元老和军中元老。毛泽东将这些人整得灰头土脸，无人敢亲近，用陈毅的话说，“鬼都不上门”，最后不得不做出“深刻检查”：向毛泽东承认自己曾有错，有大错，大错在反对过毛、嘲讽过毛，至少是冷落过毛；并向毛泽东表示自己将洗心革面，将恭恭敬敬地俯首于毛，老实地听命于毛。

不过，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此番整风整得过火过重，整得许多做检查者积怨甚多，口已服而心未服。因此，他对“延安整风”整人事是心存戒意的，戒意那些挨了整的人伺机翻案。他的这种戒意是十分持久且十分敏感的，以至历经二十余年也能一触即发。

1967年2月16日，陈毅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生了激烈冲突。陈毅在冲突中并在气头上，提起了“延安整风”的旧事，流露出心底深藏的积怨。

陈毅抱怨毛泽东在此整风运动中重用一些“最起劲”地拥护自己的人，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可这些人到头来又成了反对毛泽东的人，并因此而成为“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的人。陈毅还抱怨自己和总理都在此整风运动中挨了整。

显然，陈毅的这一抱怨，既有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憎恶之情，也有对这场运动主持者的讥讽之意。

据当事人王力回忆，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他与张春桥、姚文元迅速整理出一份会议纪要，当晚赴毛泽东处汇报。“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

2月18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怒斥陈毅等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发难，并回应陈毅个人对“延安整风”的抱怨，“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于是，中央政治局奉命整肃陈毅等人，并迫使他们低头认错，再做检查。

五十年代，毛泽东发动“反右倾运动”，又整了许许多多的人，先是在庐山上整出了一个以彭德怀为首领的“军事俱乐部”，继又在庐山下整出了数百万遍及全国各行各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整得这些人都做了“深刻”检查，痛说自己是极其错误的而毛主席是极其正确的。

可是，“大跃进”最终导致巨大灾难的铁定事实，证明了挨整者是正确的而整人者是错误的，准确地说是“有罪的”；证明了此时的真理与此时的权力是分离的，准确地说是后者践踏了前者。

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做出某种让步，某种很有限的让步：一方面表示，“反右倾”反得有些过火，把许多“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因此，“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整彭德怀整得完全正确。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则在一旁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毛泽东所做出的这一有限的让步迅即获得强烈反弹：

在下面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下子被甄别平反了数百万人，从而凸显了整个“反右倾”运动的冤屈性和荒诞性。

在上面的“右倾机会主义首领”彭德怀再度上书，洋洋八万言以作抗辩：一是你们强加于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罪名，已被“大跃进”惨遭失败的事实所否定；二是你们强加于我的“里通外国”等罪名，没有根据，纯属捏造。

面对这一局面，毛泽东坐不住了，起而批判所谓“翻案风”：

其一，指责甄别平反工作搞过了头，把许多不该平反的人给平反了，“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其二，指责彭德怀搞翻案，并为此而加大对彭德怀的整治力度：一是加重反党罪名，将“庐山会议”上还没有完全定下来的有关彭德怀的两大罪名——“里通外国”罪名和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罪名——正式公诸党内；二是剥夺政治待遇，不准彭德怀出席中央会议和登上天安门，不向彭德怀发送中央文件，不让彭德怀自由外出活动；三是成立专门机构，全面审查彭德怀的历史，以搜集乃至炮制各种能证明彭德怀一向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证。

此后，毛泽东就一直对彭德怀案保持高度戒心，一直将此案视作政治禁忌，不容任何人对它有任何质疑。

他的这种戒心，有时戒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如疑心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存心要给彭德怀翻案：“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他也正是借批判此剧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六十年代，毛泽东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整了更多的人。绝大多数执政党高干都受到程度不一的冲击，或被贴大字报，被指责为“走资派”，遭口诛笔伐；或被拉出批斗，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罚跪，既遭口诛笔伐，又遭拳打脚踢。在这些受冲击的中共高干中，有一部分人在经历了一轮轮批判并做出了一遍遍检查后，终于获得“解放”，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对于这些重新复出的老干部，毛泽东是心存矛盾的：既很想用这些富有政府管理经验的人来帮他治理这个乱糟糟的国家，以结束“天下大乱”的局面；又很顾忌这些吃够造反派苦头的人心存怨恨，而有可能在官复原职后否定“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一矛盾心态，突出地表现在他对邓小平的重新起用以及再次废黜上。

1971年9月，林彪出逃身亡。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鉴于中枢空虚，毛泽东有意重新起用已被打倒多年并已做过多次检查的邓小平。

不过，毛泽东深知邓小平不仅是一个“人才难得”而能担当大任的人，而且是一个很识时务而能伸能屈的人，一个须低头时就低头、能出手时就出手的人，一个颇得他老毛真传的人。因此，他又担心邓小平既能于台下认错，也能于台上翻案，翻他本人被打倒的案，翻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泽东与邓小平有很深的袍泽故旧关系，不仅前者深知后者，而且后者也深知前者。

邓小平深知毛泽东此时既想扶他上台，又担心他一旦上台就会翻案。于是，他写信向毛申

明：自己此前挨整乃至被打倒是咎由自取的，一点儿也不冤枉；因为，自己的的确确犯了严重错误，犯了追随刘少奇对抗毛主席这一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因此，自己若是能重新上台，就只能努力工作以将功补过，而不会搞翻案活动。

邓小平还深知毛泽东深知他邓小平是一个能起能落能又起的人，是一个还有可能变来变去的人；于是，他又在信中向毛泽东申明：自己不仅现在不搞翻案活动，而且永远不搞翻案活动。

毛泽东在得到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个“永不翻案”的重诺后，便把他从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委以重任。

不过，话说得太满就不免会让人生出疑心来。邓小平所说的这个“永不翻案”的话，就有点太满、太绝对。因为，一个能伸能屈能又伸的政治家，或一个“与时俱进”的政治家，却做出一个有关永远不变的重诺，总不免让人觉着他这是在说过头话，在说那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过头话。

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一“绝对”的承诺，并未赢得毛泽东所给与的那一“绝对”的信任。毛泽东对邓小平仍心存疑虑，并采取了一些防范性措施。

例如，在邓小平获准复出时，毛泽东便把邓小平写给他个人的那封信，作为中央文件广为传达。他这样做是要让天下人都能知道，邓小平是在既辱自己又发大誓的情况下出来工作的，进而让天下人最终都能看到，邓小平究竟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还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人，并藉此而让他有所忌惮，不敢轻易搞翻案活动。

又如，在邓小平复出一段时间并露出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迹象后，也是在毛泽东将要离开人世前，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主持做出一个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总评：“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显然，他这是对邓小平不放心，要邓小平再做一个最终表态，一个最终誓言不翻“文化大革命”案的表态。

然而，这一次邓小平没有低头就范，没有在毛泽东希望他做出的最后誓词上具结画押。邓小平推说自己在九年（1966—1975）“文化大革命”中，有六年（1966—1972）被打倒，脱离了这场运动，成了一个“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因此，不适宜由自己来主持做这个决议。

邓小平本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至少在毛泽东面前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须低头时则低头；可这一次却表现得不那么灵活，须低头时不低头。对于邓小平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这一问题，人们可以作出多种解释：

或说他受得了毛泽东的辱，但咽不下“四人帮”的气；

或说他不愿再一次自己羞辱自己，并被公诸世人；

或说他已被他的这个总爱折腾人的老首长翻来覆去地折腾得够够的了，实在是不想再这样被折腾下去了；

……

笔者在此则要强调另外一种解释，也是以往人们不大提及的一种解释：就是邓小平此时已经知道毛泽东活不了多久了，准确地说话不过来年了，因而在考虑自己进退时，就要从长计议了。

据毛泽东保健医生李志绥记述，1974年7月，经国内几位顶级神经内科专家会诊，毛泽东被确诊患上了运动神经元症（motor neuron disease），或称肌肉萎缩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预计只能活上两年，即只能活到1976年。这一诊断结论随即被汇报到中共高层。周恩来在听了汇报后说：“这就是绝症了。”

显然，作为中共高层人士且又作为周恩来重要助手的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的这一病情。因此，他这时若要决定做出某一重大举措，就不仅要考虑这一举措在毛泽东活着时会有什么意义，而且要考虑这一举措在毛泽东去世后又会有什么意义。

两相比较，他自是要看重后一层考虑。因为，他知道自己若不出意外，就会比毛泽东活得长久些，并会在毛泽东去世后大有作为；他还知道除了毛泽东以外，在这国中就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压得住自己了。

因此，他不会不明白自己此时所作所为，就不能只是对行将就木的毛泽东负责，还应对毛泽东以外的人和事负责，于私来说，还应对毛泽东死后的自己负责；于公来说，还应对毛泽东撒手后的中国政局负责。

于是，他就有可能抱着这样的态度：老人家，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此次横直不会再替您老去趟那一滩由您自己费心费力搅浑的政治污水，不会再替您老去背那一只由您自己耗时耗物铸成的“文革”黑锅。

鉴于邓小平拒绝再次低头就范，毛泽东对于他的态度便由猜忌上升为恼怒：你不再次向我低头，我就再次将你打倒。于是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深揭狠批这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1976年4月7日，毛泽东责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此高压之下，邓小平故态复萌，再度变原则性为灵活性，须低头时便低头。他随即于4月8日上书毛泽东，对上述决定表示“完全拥护”，对主席能允许他继续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谢”。

### （3）

接下来的问题是，“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这一手法，对于毛泽东来说有何意义呢？能获得什么样的效用呢？

与前文所论述的“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那一手法相似，这一手法也能获得现实与历史两方面的效用。

其现实效用主要表现为，既可以有力地打击乃至羞辱挨整者，折其锐气；又可以有力地维护乃至提升整人者，使其神化。

迫使挨整者做出检查，就是要让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向毛泽东低头认错乃至认罪。

其一，如果这个检查是违心的，那么，检查者就不仅是当着众人的面说“对不起”的话，而且是对着自己的良心说“对不起”的话。这就既有损他的颜面，使他难堪得很；又重创他的良知，使他愧疚得很。



明晓了这一点，就比较容易理解曾屡屡向毛泽东做违心检查的周恩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表现：在其他人的面前，总显得风流倜傥，儒雅高贵；而一到毛泽东面前，就变得唯唯诺诺起来，甚至变得低三下四起来。

其二，如果一个人能够让许许多多的人向自己低头认错乃至认罪，那么，这个人就能显得高人一等。又如果在这许许多多低头认错乃至认罪的人中，竟还有一些非同寻常的人，比如那种智勇超常的人，那么，他们向之低头认错乃至认罪的这个人就会显得不是高人一等了，而是高人许多等了，即超人，即神。

比如，毛泽东能够迫使中共党内最显才智的周恩来总理向自己低头认错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在中共党内的魔力是无与伦比的。又如，毛泽东能够迫使中共党内最为刚勇的彭德怀将军向自己低头认错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在中共党内的权势是不可抗拒的。正如李锐先生所言：“庐山会议这场惊心动魄的党内大斗争，对提高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做出了一次新的贡献。”

其历史效用主要表现为，可以将这些检查“立此存照”，留作不利于挨整者而有利于整人者的历史证据，即通过留存这些检查而告诉后人：连挨整者本人都承认自己是错误的而整人者是正确的。这就使得毛泽东有可能把自己对于政敌的胜利，从现实里延续到历史中。这就使得毛泽东有可能避免遭受因做了整人坏事而留下历史骂名的恶果。

显然，毛泽东不仅相信“成者王侯败者寇”，相信“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而且有意实践这一信条，有意借重胜利者的权势而有选择地收存甚至不惜制造一些于己有利的史料，一些能够证明自己整人整得十分有理的史料，一些能够标榜自己一贯正确故有王者气象的史料。

由此可见，毛泽东还是很在乎历史的，很在乎自己在历史上将会有什么样的记录。

在中共高层数十年政治角逐史中，那些被打落台下的失败者们，不管是属于罚而当罚的自食其果者，还是属于罚不当罚的蒙受冤屈者，统统都被要求做出深刻的检讨，留下认错的字据。其中，绝大多数者都会照此办理，只有极少数者拒绝做检讨。而在这极少数者中，又因蒙受冤屈而拒绝做检讨者就更少了，并因此而更显得稀缺，更显得难能可贵。

2004年3月20日，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在与赵紫阳谈话时提到：“李锐同志说过，党的历任总书记多是以检讨、认错方式结束任期的。只有你和陈独秀没认错。”

赵紫阳当时因患严重呼吸系统疾病，而只能插着氧气管、半躺着说话，可一听到姚监复说的这些话，便一把拔下氧气管，猛地站起来，走到姚的面前，指着他说：“你说陈独秀？”

姚答道：“不是我说的，是李锐同志说的。”

赵紫阳听后哈哈大笑，并来回走动，很是兴奋，一扫病容。

姚先生后来向笔者回忆道，从谈起这个话题，到大家一起合影，直至他们离开赵家，赵紫阳始终都保持着这种好心情，谈笑风生，一点都不像是一个病得快去世的人（赵紫阳于十个月后病逝）。

从这位被软禁者的这阵朗朗笑声中，我们可以听出一些耐人寻味的笑意来，可以听出这位晚辈总书记对于那位前辈总书记有着一种十分欣然的认同感，认同他们这两位隔代总书记有着

相似的政治境遇：一是都在自家党中遭受不公正对待，并被要求做到俯首认错；二是都在这种压力下坚守政治家气节，拒绝做出违心检讨。

这种认同感可以说是一种对历史的虔诚感，毋宁说是一种对历史的敬畏感。其间隐有这样一种信念：

坚信历史终究是要讲求公道的，终究是要对现实中的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做出公正评价的，对行善者予以褒扬，对作恶者予以贬斥；因此，那些生前蒙受冤屈的行善者将会在历史中得到应有的补偿，而那些生前制造冤屈的作恶者也将会在历史中受到应有的清算。

例如，陈独秀生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身后则获得相当高的评价。并且，这种评价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进一步的提升，至少他拒做违心检讨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家气节还会获得进一步的彰显。

与之相反，那些曾不公正对待他的人，例如那些先是指导他怎么做继又指责他这么做的苏俄党人，以及那些不分是非地按照苏俄意图指责他的中共党人，都将在历史中还其本来面目，或还某些苏俄党人的那种不敢承担有关误导中国大革命失败责任的怯懦者面目，或还某些中共党人的那种崇苏媚俄的盲从者面目和势利者面目。

正是基于对陈独秀这一历史际遇的考虑，我们有理由相信，当赵紫阳听到上述把他与陈独秀相提并论的话时，一定会感到由衷的高兴，毋宁说是由衷的荣幸。

一些中国人对历史的敬畏感有些近似于那些教徒对上帝或真主的敬畏感。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坚信其敬畏对象，无论是历史还是上帝或真主，都具有公正性品格和终极性审判法力，都能够对人间是非做出公正的终极审判，使善恶最终各得其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历史可以说是一些中国人尤其是一些中国读书人心中的“上帝”，是他们在一生中尤其是在紧要关头时最为倚重的精神支柱。古有文天祥赴难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有林昭绝命辞：“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这些中国读书人都敬畏“永恒”，看重“三不朽”，即能够刻诸青史的德行、功业和言论，因而也就在终极价值上把历史看得高于现实，坚信历史终将裁决现实，评品现实。

也正是基于这种对历史的敬畏感，赵紫阳在1989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反对军事戒严，拒做违心检讨。

1991年7月10日在被软禁的居所中，赵紫阳对颇费周折地前来探视的老战友宗凤鸣说：“我个人这个结局全是自己的选择，正如邓小平与一位国外学者所言，‘赵紫阳是自我暴露’”。“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有三种情况可供选择：一是说服邓改变‘4·26社论’，改变关于学生运动的‘动乱’定性；二是要滑头称病，当两面派，但我身体很好，说不过去，再说以后也不好办，还会批我反自由化不力；三是目前这个选择。”

宗凤鸣随即追问：“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下决心做这样选择的？你当时是怎样考虑的？”

赵紫阳答道：“我不愿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帐”（据赵身边的人说，赵紫阳在‘六四’事件发生前，曾一再声称：从历史上看，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赵紫阳还曾对另一位老战友赵健民说过这样的话：“宁愿自己总书记不干，也不做历史罪人。”赵健民也曾鼓励过赵紫阳：“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做‘违心检讨’。”

赵紫阳无疑坚守了他对历史的信念，或说是履行了他对历史的承诺，为不做历史上的罪人而做了现实中的囚徒，准确地说是做了现实中的被软禁致死的囚徒。

赵紫阳也无疑没有辜负赵健民、李锐等老友对他的期待与赞许，就像他的前辈陈独秀那样没有做“违心检讨”，也就是说，没有重蹈毛泽东治下的那些挨整者的覆辙，没有再像他们那样在挨整后又给历史留下许多不清不白的字据，许多对挨整者不利而对整人者有利的字据。

## 结 语

笔者以上考察毛泽东整人方式是为了论证毛泽东惧怕历史。读者则可能会再由此而追问笔者：论证毛泽东惧怕历史又能够说明什么呢？

在笔者看来，这一论证至少能够说明，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毕竟还拥有着能够让毛泽东多少感到有些害怕的东西。

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简言之，是一个自称是“无法无天”的人，更是一个确确实实做出了许许多多“无法无天”的事的人。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还有害怕的东西。

而能让毛泽东多少感到有些害怕的东西，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简言之，是一种叫做“历史”的东西，准确地说，是一种叫做“中国传统历史记述”的东西。这一“中国传统历史记述”坚守着“公正”（善善恶恶）理念和“永恒”（不朽）理念：

凡是上了史的人，只要做了坏事就应受到贬斥，即便死了也应受到追诉，以使他遗臭万年；同理，凡是上了史的人，只要做了好事就应获得褒扬，即便死了也应获得追认，以使他流芳百世。

坚守着对“公正”（善善恶恶）与“永恒”（不朽）的信念，可以说是在坚守着我们这个民族所拥有的一种核心价值，也可以说是在坚守着所有伟大文明都拥有的一种普适价值。

因此，笔者论证毛泽东惧怕历史的一个应有之义，就是要说明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尽管不时孳生许多邪恶的东西，但最终还是邪不压正的，还是要讲公道常理的。

或者说，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尽管不时孳生许多病态的东西，但仍然保有健康的根基，保有再度复兴的可能。因此，若要复兴中国文化，就必须复兴中国传统历史记述，“使中国人能恢复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余英时先生语）。

或者说，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尽管不时显现某种堕落的取向，但这种堕落的取向是有一个底线的，而这个底线是有正面价值的。因此，笔者论证毛泽东惧怕历史，就是试图触摸这个价值底线。

~~~~~

## 【文革点滴】

### 随卫江青的回忆

• 邬吉成 • 杨宇宁 •

## ◇ 随卫江青去海南

### （一）不愿接受的任务

1970年11月13日，中央警卫局原局长、中办主任汪东兴找我说：“江青要去海南，由你陪同她去。”

我因对江青喜怒无常的性格很了解，想设法避开，于是对汪东兴说：“我对海南岛情况不熟悉，恐怕跟不好呵。”汪东兴说：“海南岛那边有人接待，别的不用你管，你就把安全工作搞好就行了。”江青住在中南海，其警卫工作一直由负责毛泽东警卫的汪东兴兼管着。这次让我随卫江青去海南，恐怕与江青地位的升迁和汪东兴嫌她挠头有关。尽管不情愿，但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我还必须尽职护卫江青。江青每单独外出一次，就如同搬家一样，要带上一大堆东西：文件、书籍、办公用品、被褥、大便坐桶等，还有大量的摄影器材和十多部电影胶片，要用两部卡车运送。在后来我陪江青外出时，也都是如此，若要是再带骑的马，辎重队伍就更庞大了。

### （二）江青本来会游泳

我们一行人包括送行的吴法宪先到了海南岛陵水的海军航空兵机场，稍事休息后又飞往三亚机场。到三亚后，我们住进了榆林港所在的“要塞区”部队大院，吴法宪做了一些安排和交代后，就返回了北京。此时的江青精力挺充沛，风尘未定，就要去“要塞区”的兔尾岭参观海防设施。11月14日凌晨三四点钟，她就又拉着随行人员一起去小东海拣贝壳。

11月15日，江青下海游了泳。以往媒体认定江青从不游泳，我和江青有八九年的近距离接触，期间多次看到江青游泳，可见江青不游泳的传闻是不准确的。

### （三）打炮引来外交麻烦

游完泳的江青，向“要塞区”的司令员王必之提出要去参观“三七高炮”阵地。王司令员同意后，我们一行分乘三辆吉普车爬上山顶。进入高炮阵地后，江青架好相机，要求几门高射炮同时射击，以便拍摄高炮射击的照片。

王司令员很为难，又不敢不答应，最后命令前后四个炮位向海空连射了数次。当时，附近的港湾里有许多渔船在进行捕捞作业，炮弹虽然没有落入作业区域，但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事后，“要塞区”领导及时就此向广州军区来海南岛检查工作的副政委任思中和海南军分区作了报告。我因为是第一次陪江青外出，一些事情的办理有什么要求，需走什么程序都不太摸底。但在前沿打炮，我感到这不是件小事。当江青的秘书杨银禄要给北京打电话的时候，我对他说：“你把这里打炮的事情，也顺便向汪东兴主任报告一下。”因为只有他那里有和北京联系的电话机，我的住处没有。但杨银禄打电话时究竟说没说，我后来一忙也就没再问。这件事竟成了我的一个大问题，汪东兴几次批评了我。

拍完炮击的第二天，江青带我们一行从“要塞区”大院搬到了三亚鹿回头的招待所。18日，她又去了三亚西边的西瑁洲岛，参观了女民兵的火炮阵地。女民兵又应江青要求，打了一阵炮。

海南岛靠近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两三天里这边老打炮，引起了越南政府和美国方面的一阵紧张，引来一些外交麻烦；同时也暴露了炮位目标，阵地不得不进行了一番调整。总之，江青颐指气使的行为，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

#### （四）北京正在下大雪

后来，江青又看了南海舰队的前沿阵地及指挥设施；还乘车去莺歌海盐场及天涯海角等处游览。在天涯海角，江青让南海舰队随去的保卫人员站到海里礁石上，照了几张以大海为背景的照片。那天风大浪急，保卫人员费了很大的劲才登上那块礁石。要不是这些人员经过特殊训练，在那种恶劣气候下海非出事故不可。

江青还从榆林港去海口、兴隆等地参观了农场、看了热带作物、洗了温泉浴。到12月2日，天气已经有些凉意，不能再下海游泳了，江青想回北京，就让秘书给周总理打电话。周总理告诉江青，北京正在下大雪，飞机不好降落，建议江青可先到上海。

#### ◇ 随卫江青到上海

##### （一）“你留下来好了”

12月4日，我们随江青改道去上海。在上海，江青接见了上海市革委会和上海警备区的负责人周纯林等。她在上海的心情好像很不稳定，一天，她叫我到她的房间说：“你可以带老申（司机）和许玉兰（护士）坐火车回北京去，我这里不需要你们了。”我对江青说：“你让我走，可我还不能走，得请示一下北京。出来时交代给我的任务是保护你，我得把你安全地送回北京，才能算完成任务呐。任务没完成，我就先回北京了，没法向上级交代呀。”

江青听了我的话说：“那你就算了，留下来好了。但他们几个得走。”结果老申和小许先行离开了上海，我留了下来。被江青这么一闹，搞得我挺紧张的，不知是出了什么错，后来的日子一直小心翼翼的。上海方面的接待人员也被弄得十分紧张。

##### （二）“你们表现还可以”

在外出的日子里，江青和我们工作人员各吃各的饭，标准不同，按规定所交的伙食费也不同，江青是每天5元钱，我们工作人员是每天5角。在上海，宾馆对我们这些随行的工作人员招待得很周到，伙食也挺好，每顿都弄两个好菜。不知江青听到了什么风声，吃饭的时候她老跑来检查我们吃什么。第一次检查后，她认为吃得太好了，批评了我们一通。这以后我们再吃饭时就格外留意，江青一过来，我们就把两个稍好一点的菜藏起来。她满意地说：“你们表现还可以嘛，吃得不算奢侈嘛。”

因跟随江青到海南、上海，在警卫上没出任何问题，江青也没挑出什么大的疵，汪东兴便把随卫江青外出的差事固定给了我。

#### ◇ 随卫江青去青岛

##### （一）尽可能地瞒着她

1971年的夏季，江青提出要去青岛休息，汪东兴、王良恩指示我和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先去青岛打前站，做好安排。7月29日，我们打前站的人员到了济南军区，军区司令员杨得

志接见了我们。

经过查看，我们认为这里准备得相当充分，即回北京。8月5日，我们随江青乘火车抵达青岛，住9号楼。9号楼离浴场很近，下海十分方便。而毛主席的前夫人贺子珍此时也在青岛休养，住11号楼。江青对贺子珍住在青岛并不知道，我们当时就觉得很难办，因为她来就让贺子珍走显然不合适；要是江青知道贺子珍和她同在一个地方，也不可能让你消停。没别的办法，我们只能尽可能地瞒着她。

到青岛的第二天下午，江青就去了栈桥和第一海水浴场。她坐在海滩礁石上怀起旧来：“我小时候家境不好，父亲是个木匠，脾气很坏，母亲和我都经常受他的气。我先到济南读书，离开济南后就到了青岛。在青岛的时候，经常到这里的海滩和礁石上玩。再后来我又去上海，就是从这里走的。”这是我第一次听江青带有感情色彩地谈私人话题。

## （二）江青摔在地板上

8月7日上午，我们陪江青乘两艘炮舰去了雪加岛要塞参观。一整天都无事，当晚江青起来解手时，可能是服了安眠药的关系，没有打铃叫值班护士。因为她有便秘的毛病，坐马桶的时间很长，往往坐着坐着就睡着了，所以一般她解大手，都打铃让护士陪。这晚她没叫护士，坐在马桶上睡着了，一下子摔倒在地板上。

第二天起床后，她觉得左肩胛骨疼痛，经拍片检查，发现她的左锁骨末端有轻微裂缝。此伤是她自己摔倒造成，又是她自己未叫值班护士，加之她的心情不错，所以没有工作人员因此而招致麻烦。我们将情况向北京汇报后，北京立即派来了以吴阶平为首的医疗小组，为江青疗伤。好在伤势不重，并没影响她在青岛的活动。

一天，济南军区的保卫部长晋国强悄悄告诉我说：江青单独找了他，让他先到她的老家诸城去看看。他问我该怎么办，我说：“你先照她跟你交代的办，去诸城了解一下，然后按实际情况向她反映就行了。最后去不去由她自己决定，对此我们不好说什么。你也不要向她透露我知道这件事，因为她本来就瞒着我们。”晋国强去诸城看完后，回青岛向江青做了汇报，但此后就没有了下文。

## （三）意外发生的爆炸

8月10日下午，江青由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袁升平、海军司令员李作鹏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马忠全陪同，到太平角100毫米高炮阵地参观。事先听说那里正在施工，我就和保卫部长晋国强打招呼说：要全面布置，检查一下，施工打炮尽早停止，该收拾的收拾，该清理的要清理干净，弄得整齐一点，不要参观时满眼乱糟糟的。当时有关方面答复我说没问题，已经弄好。据说济南军区保卫部的同志、海军和青岛警备也确实为此作了部署和检查，当时没发现有任何纰漏。

然而，正当江青到阵地上刚下汽车，施工区域里突然间发出两声巨响，爆炸崩起的碎石有三四十米高，许多石粉落在了江青的汽车附近，使她受到了惊吓。后查明爆炸是两个哑炮造成的，施工部队已经停工了，但有两个哑炮没有排除，偏偏在这个时候响了。

我接受了海南岛的教训，当晚即给北京写了报告，认为这是一次责任事故。我在检讨中说：虽然事先做了通知和布置，但我没有亲自严格地检查落实，导致了一次危险事故的发生。

在青岛期间及离开以后，我都没有听到有关此事如何处理的消息。直到“文革”结束后，我才听说因为那次事故不久以后发生了“九·一三事件”，这个偶然事故随即被上升为“政治事件”，许多人都被牵连进去了，有的被审查，甚至还有被逼自杀的。

#### （四）江青的情绪很不好

8月11日晚7时，东海舰队在迎宾馆宴请江青，作陪的有杨得志、袁升平、李作鹏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马忠全及政治部主任孙川、青岛警备区司令员谭遵楷，此外还有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等。就是在这个宴会上，江青听到了贺子珍也在青岛休养的风声。

第二天护士报告说，江青起床后情绪很烦躁。她把秘书和警卫叫去，指责说：“你们工作做得很不细，我在这里到处受风吹，办公室没有门，老是有贼风吹我。护士的工作做得也不细。整个工作你们都要很好地研究，找差距！”

江青休息后，我们这些随行的工作人员马上聚在一起开会，商量要尽可能地做好江青的服务工作，同时还分析了江青情绪突然变化的缘由，有人推测是否与昨晚宴会上知道的事有关，有人推测可能是李敏的儿子小宁宁说漏了嘴。中午，江青去了海水浴场，但情绪依然不好，说有风，又匆匆返回住处。

8月13日中午12时，李作鹏和孔令华、李敏夫妇去迎宾馆探望江青。照相吃饭后，大家在小礼堂看电影。看完电影，江青突然提出要做两件事：一是要青岛方面给她住的9号楼凉台搭席棚；二是看过电影的全体工作人员都要进行消毒（她认为看的电影有问题）。

到了8月14日，江青的情绪更加烦躁不安，说在青岛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提出要马上回京或去济南。她让秘书杨银禄给北京打电话要求回京，北京方面回话说待请示首长再定，这个“首长”大概是指毛主席和周总理。15日，北京来电话说可以回京。翌日，江青即从青岛返回了北京。

#### ◇ 随卫江青到广州

##### （一）第一次随卫江青到广州

1972年初，我随卫江青到广州，住南湖宾馆1号楼，毛主席住7号楼。广州军区的领导对江青的接待很重视，专门由当时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军区副司令员吴纯仁挂帅，组成有军区保卫部、管理局领导参加的接待班子。

我们陪着江青在广州市内转了一些地方，有一天，江青突然提出要到林彪在广州住过的地方去看一看。吴副司令员随之作了周密的安全布置，并派人提前去检查、准备。参观那天，江青刚进林彪住处时还很高兴，可过了不一会儿，就很气愤地说要离开。回到南湖的住所，她的脾气更大了，嚷嚷说有人要暗害她。她还说吴纯仁是林彪的人，故意把她带到林彪的住所里去。这次她在广州仅住了几天，就匆匆返回北京了。据说吴副司令员为此倒了大霉，从此再也没有露面。

##### （二）第二次随卫江青到广州

1973年春，江青要去广州。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亲自带毛维忠、我和江青处的工作人员同去打前站，还专门从北京带去了两三台窗式冷风机。

我们到广州先看了江青上次住过的南湖宾馆1号楼。此时的1号楼经过一番装饰，环境比以前更为幽雅。但汪东兴看了以后感到不是特别满意，就又去看了广东省委的小岛招待所，决定江青来时住此处。毛维忠赶紧带着人连夜加班，把窗式冷风机安装在江青住处的办公室和寝室内。

江青到广州后，占了三元里的温泉游泳池，只要她去游泳，就不许游泳池对外开放。逗留期间，她还跑到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会上讲了一通话，据说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 （三）第三次随卫江青到广州

这次到广州住松园1号楼。江青除了到佛山参观陶瓷、编织业展览，到公园游览外，主要是在“松园”游泳。为了使她无须穿过市区复杂路线，就能在舒适的水温中游泳，广州专门从三元里将温泉水引到松园的露天泳池。

在这样幽雅的环境中，江青还是屡屡找茬儿，把周围的人弄得寝食不安。她一会儿说冷风吹她了，一会说温度没有调好，再就是说放映的影片不好。一再要求随行人员研究怎么搞好服务。

根据江青的表现，我估摸着她是又住不下去了。果然，她很快提出要回北京。周总理接电话后，派杨德中带刘崇福驾驶新购买的一架波音707飞机，专门到广州接她。

广州军区听说江青要走，几位负责人去了江青的住所看望她。离开时，他们说已经准备了便宴，为她饯行。江青当时答应出席便宴，但后来却不知是什么缘故没有到场。

整个广东的行程虽没出什么问题，可江青却诬蔑我和她身边的一位女护士不清楚，要组织上对我进行处置。问题起因于在广州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江青被冷风吹着了，她指责身边的一位护士没关好窗户，要我组织随行的工作人员开会批斗那位护士。我觉得这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开会说了一下，既没组织大伙批斗她，也没逼她做检讨。过场走完了，我对江青说：“护士没有掌握好你看电影的时间，窗户关晚了，对影响你的健康是有责任的，她已经承认了错误，我们也对她进行了批评。”

本以为这样就敷衍过去了，可不知是江青身边的哪个工作人员，告诉江青说我根本没有按照她的要求，狠狠地整那位护士，因此引起江青对我的极度不满，便给我定了这么个不光彩的罪名。

既然江青怪罪下来，汪东兴不能不做一番调查。他向同去广州的江青处的党支部书记程汝明做了询问，程汝明悄悄说：“江青讲老邬和女护士不清楚，简直是胡说八道。”

自从负责起江青的警卫后，总有些磕磕绊绊的事，我早想撇开随卫江青的事，经这次江青挑眼后，恰好得以把这伤脑筋的事给免了。然而，我还想撇得更干净一点，就向汪东兴请求：“把钓鱼台的警卫工作移交别人管理吧，我还是回中南海做点部队的工作。老在这儿干下去，不知哪一天会给我定个大罪关起来。”

汪东兴说：“再等等看。你可以不管10号楼的事，把重点放在管钓鱼台住地的安全和外宾来访的警卫工作。”



#### （四）江青第四次到广州

过了不久，江青又一次去了广州。这次，她点了中央警卫团的副参谋长李连水的名，要他负责安全保卫。但许多安排工作还是由我在幕后负责操办的，我后来听说江青这次到广州没安排什么活动，就是约美国女作家维特克长谈。借美作家之笔，写她的“光荣”历史。后来，这位作家出版了一本叫《江青同志》的书。”

#### ◇ 随卫江青到天津

##### （一）露骨的讲话

1974年6月15日晚11时，汪东兴告诉我，江青要去天津，让我随卫。6月19日，江青由纪登奎陪同，来到天津，住天津招待所1号楼。

江青到天津的最初几天，没有外出活动，就是在招待所里召来天津市的负责人谈话。毛主席有一个叫王曼恬的亲戚，当时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她也到招待所来和江青长谈过。除此之外，江青就是到天津俱乐部去游泳，游泳池的水是引来的温泉水。

在我们到天津的前几天里，江青、王洪文、姚文元曾两次开会，召见“梁效”等写作班子成员，大讲所谓儒法斗争延续到现在应借助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把批判之火往上引。江青说：“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她还特意强调：“注意，大儒不是指刘少奇，也不是林彪、陈伯达。”

到了天津，江青的讲话就越来越露骨了。她还在“天津市儒法斗争报告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散布“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观点，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大儒”。继而她又到工厂、农村、部队走动，煽动“揪现代大儒”。江青说的“现代大儒”是指周总理。

##### （二）周克周的由来

一天，江青在俱乐部和解学恭、王曼恬谈话时，问起天津警备区司令员吴岱到哪里去了。他们告诉她，吴岱到宝坻县小靳庄去了，那是吴岱抓的一个点，是天津学大寨的一个先进生产大队。当江青得知小靳庄批林批孔搞得很活跃时，立即提出要去那里看看。

第二天，我就随天津的同志一起去探路，发现从火车站到小靳庄有一段土路很难走。天津市委的人提议派人把那段土路抢修成石子路。我觉得那样既浪费又影响不好，但这事不好由我拿主意，我就向纪登奎做了说明。纪登奎也赞成我的看法。最后没有修石子路，而是对土路进行了一番平整。

尽管路不好走，江青还是于6月23日前往小靳庄。她召来了侯隽等下放知识青年和公社社员，又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又是送批林批孔材料。她对在场的人说：“现在有没有儒呀？大儒呀？我看是有的。我们就是要批他。从你们这里创造出经验，就可以向全国农村推广了。”

当江青听说小靳庄的妇女主任叫周福兰，就说：“啊呀呀，‘福兰’这两个字太封建了嘛，我给你改个名字吧。你就叫周克周吧。”她见妇女主任一副不解的神情，便解释说：“克周就是用咱们这个周，克他那个周。”

### （三）“小靳庄是我的点”

吃过午饭，江青在一户社员家睡了午觉后，才返回天津。在回天津的火车上，不知怎么扯到了三大战役的话题。江青就要吴岱介绍“平津战役”的经过。吴岱讲完，江青又问他原来是哪个部队的。吴岱刚回答是四野的，江青马上叫起来：“你是林彪的人！”经江青这一咋乎，吴岱的心脏病顿时发作，到天津市就住进了医院。

7月，江青又一次去了天津。去之前还是我打的前站，在第一招待所的1号楼里安装了供氧设备。江青到天津时，汪东兴也来天津看了一下。这次来天津期间，江青又去了一趟小靳庄。

1976年8月，江青再次去了小靳庄。唐山大地震后的天津有许多房屋倒塌。江青来后，只乘车到市内几条街道转了转，也没敢在城里过夜，而是在来时乘坐的专列上住宿。

第二天，江青到了小靳庄。我们跟随她到各处都转了转，还进到受灾群众住的地震棚里坐了坐，了解了一些情况。接着，江青和村里的社员们见了面，表示了关心和慰问，还和社员及到这里抗震救灾的人员一起，参加了搬砖传瓦等拆除危险房屋的劳动。因为那次去小靳庄没有带摄影记者，我就用自己随身带着的照相机，拍了一些当时江青活动的情景。从小靳庄返天津，江青在火车上接见了几位在津唐一带抗震救灾的部队领导，又乘车到天津市区转了几次后返京。

江青第四次去小靳庄，是在当年9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使伊梅尔达·罗穆亚尔德斯·马科斯夫人访华。本来，马科斯夫人在华的外地参观并没有到天津的日程，江青知道后，非要外交部安排马科斯夫人去天津。

江青陪着马科斯夫人去了小靳庄。他对马科斯夫人说：“小靳庄是我的点，也是中央的点。”但是这里自从被江青搞成“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型后，并没有什么适合外国人参观的内容，只是召集社员唱唱歌，念念诗，伊梅尔达不知所云，搞得外交部礼宾司方面很尴尬，却又无可奈何。

### ◇ 随卫江青到长沙

#### （一）江青畏惧毛主席

在筹备四届人大之际，江青要去长沙见毛主席，于是给随同毛主席在长沙的汪东兴打了一个电话，问由谁担任湖南行的警卫负责人，汪东兴说：“还是让邬吉成跟你来。”

随后，汪东兴给我打了电话，通知我随江青到长沙。我根据汪东兴的通知，对赴湘的行程和乘机等交通事宜做好了安排。到长沙后，江青就住进了蓉园的4号楼。江青的住处，在毛主席的住处下面，相距不远。

住下后的一天，江青对我说：“你准备车，咱们到上面去。”我想她来长沙就是见毛主席的，那么她说到上面去，自然是要到毛主席那里。即便是江青见毛主席，也必须先做请示批准。我以为她已经联系好了，于是就调了车，并布置说去见毛主席。

江青上了车，我们就跟在后面，直奔毛主席的住处。也就是一两分钟，车子就开到了毛主席住楼停车的门厅里。守卫这里的警卫团一大队副大队长陈长江见有车子进来，就走了过来，打开车门见是江青，就说：“主席还在睡觉呢，请您稍等一下。”

江青一见是陈长江，脸色一下就变了，说话也紧张得有些变调：“不对，不对，怎么到这里来啦？不是到老汪那里吗？快走，快走！”因为她知道陈长江所在的一大队是紧随毛主席担任保卫的，在没有事先请示并获得同意的情况下，就闯到毛主席的住所来是违反纪律的，于是江青车也没有下，就叫陈长江赶快把车门关上了。

我这才知道，江青事先叫我安排车子时跟我说的到上面，不是到毛主席这里，而是要到汪东兴住的地方。于是，我们马上从毛主席那里出来。这是我第一次见江青露出如此大惊失色的神情，连她不经事先请示就见毛主席也会吓成这个样子，看来她对毛主席还是相当畏惧的。

车子又转到汪东兴、张耀祠的住处，江青进去见了汪东兴，我在外面等着。我不知他们谈了些什么，但记得江青在里面呆的时间比较长，估计是在见毛主席前，询问一些有关毛主席的近况吧。

## （二）毛主席批评了江青

第二天，汪东兴又把我叫到他那里，问了我许多有关钓鱼台里的情况，江青如何如何，张春桥如何如何，王洪文如何如何……反正他问什么，我就尽我所知做了汇报。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毛主席提出过“上海帮”、“四人帮”的事，而且还对他们做过批评。但我想汪东兴当时应该是知情的，所以向我了解毛主席不在北京期间，他们在北京活动的情况。

后来，江青在长沙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就是在这次见江青时，对她进行了批评，要她不要当后台老板。在许多回忆文章中都讲述了王洪文、周总理到长沙，其实江青也去长沙见了毛主席。

## ◇ 随卫江青到大寨

### （一）浩浩荡荡进大寨

1975年9月初，江青由陈永贵陪同，乘坐火车，带着自己经常骑的马及一些生活物品，赴山西昔阳县的大寨村。大寨党支部的领导成员们得知毛主席的夫人要到大寨的消息，十分欣喜和重视。他们专门前往阳泉火车站迎接江青，还在大寨的村口组织了两路群众夹道欢迎。用当时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风莲的话说，叫做“浩浩荡荡进大寨”。

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3700多人，昔阳县城里没有能容纳这么多人的大礼堂，好在昔阳刚刚兴建了一座拖拉机厂，有一个车间尚未安装，于是就将此车间当作会场，与会者每人发一个小凳子。会议的主题报告由华国锋来做。

### （二）不能阻拦邓小平的车

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要在会议上代表中央讲话，故而在会议开幕前，邓小平同志偕夫人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候补委员吴桂贤，从北京赶到昔阳。

得知邓小平要在开幕那天上午到达昔阳县，而且有到大寨的安排，江青随即专门向陈永贵和我交代说，如果邓小平到昔阳先来大寨，不要让邓乘坐的车直接开进招待所。

因为江青长期随毛主席生活，养成了和毛主席相近的生活节律，晚上睡得晚，上午通常仍

在睡眠中。她是怕邓小平等人的车子进招待所动静大，吵了她的睡梦。

陈永贵觉得这很难办，如果邓小平直奔大寨招待所而来，难道还能真把他乘坐的车子远远地拦下来，让他步行进招待所吗？他让我帮助拿个主意，我很干脆地对他说：“哪能都按照她的要求做，如果邓小平的车子开过来，是绝对不可以阻拦的。”

然而，邓小平一行到昔阳后，没有前往大寨，而是直接去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会场，免却了弄不好可能会引起的事端。邓小平的这一决定，着实使陈永贵和我们减轻许多心理负担。

### （三）会上胡乱插话

在会议开幕式上，邓小平讲话刚开始，江青马上插话说：“邓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派来的。”她还抢着宣布：“主席要邓副主席在会上讲几句话。”而且明知中央会前已议定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把手不参加会议的江青，还在不知情的会议代表面前插话说：“这些第一把手不到会，是对农业不重视。”

会议期间，我记得邓小平、华国锋、江青、陈永贵、姚文元、吴桂贤等参观了大寨人在沟壑山峦中营造的梯田。那是临近仲秋的收获季节，田里的农作物穗长粒饱，沉甸甸的，煞是喜人。新华社摄影部的副主任、中央新闻组组长杜修贤，为这些中央首长们拍了不少以田间地头为背景的照片。我至今都留存着一张当时同这些领导人在一起的合影。江青除拍摄了大寨的风光照外，还兴致很高地为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华国锋等人拍了照。

在这一团和气的背后，是“四人帮”正和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进行着暗暗的交锋。1975年7、8、9三个月，邓小平坚决而果敢地推进着他的全面整顿。邓小平的所作所为，使“四人帮”敏锐地感到，邓的理念同他们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且邓的地位愈稳固，愈将阻碍他们对党和国家更高支配权力的攫取。因此，他们千方百计想给邓小平罗织一些罪证，使之失去毛主席的信任。

### （四）江青受到毛主席批评

会议原本没有安排江青讲话，她却在一次大寨干部、群众大会上发表长篇大论，大谈当时正在进行的“评《水浒》”运动。她煞有介事地说：“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接着，她别有用心地发了一通关于《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的议论。在另一次座谈会上，她又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随后，江青要把她几番言论的录音在大会上播放。负责这次会议的华国锋认为不合适，并报告毛主席，毛主席批示：“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发，录音不放，讲话不印。”

### （五）我替陈永贵出主意

一天，江青提议要和全体文艺战士们一同参加劳动实践，便带着一群人去大寨有名的虎头山、狼窝掌，一路上喜笑嫣然。

江青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些油莎豆的种子，要大寨人在山地上种植。油莎豆在中国是罕见的油料作物，属热性作物，大寨人从没有侍弄过，也不适合在大寨这个纬度的山地种植。可江青要在这里种，大寨人能有什么话说？

江青骑着从北京带来的马游山，突发奇想地提出在虎头山顶上挖防空壕。江青带头挖，又拍照，又拍电影，还叫跟随的人一起挖，挖了一条连手榴弹炸也经不住的防空壕。

除了在田间地头动干戈外，江青还生出改造大寨窑洞的念头。大寨的窑洞都是单眼的，互相不连通，没有里外间。江青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找到陈永贵，要他布置人员，把她住宿和使用的三间单眼窑洞从里面打通，使卧室、起居室、办公室合成套间。

从里面打通窑洞这种事，在大寨没有先例，陈永贵和山西省委书记王谦都觉得江青的要求难以满足，可又不好直来直去地回绝，便找我商议如何应对。

我当年打过窑洞，特别是经历过西柏坡窑洞塌方的教训，想起那往事也就想出了对付江青的主意。我告诉陈永贵和王谦：“你们就说大寨的土质是平质型的，支撑力不够，横向打通可能会塌下来，太不安全了。”陈永贵他们把我的这番话在江青面前学了一遍。这招果然灵，江青再没提改造窑洞的话茬儿。

#### （六）执意二次去大寨

江青第二次到大寨，是1976年的9月初。据说江青在离京前，曾和王洪文、张春桥等在钓鱼台的17号楼开了一个碰头会，商议“批邓（小平）”“倒叶（剑英）”，“拉华（国锋）倒华”（即能拉则拉，拉不过来就打倒）。在这之后，江青说：“我看主席的病就那样了，有你们在，我也就不陪了，明天准备去山西大寨看看，做做下层的工作，造造舆论。”第二天，江青不顾中央其他领导人以毛主席病情恶化对她的挽留，带上众多随从人员，乘坐豪华专列去山西。专列挂了7节车厢，还有两节拉马及一应物品的车皮。

#### （七）江青批评郭风莲

江青到大寨后，要看她的油莎豆长得怎样了。一听她这要求，陪同她的大寨人顿生忐忑。因为油莎豆生长的合适地温在30摄氏度以上，而大寨的地温天气热的时候也就20多摄氏度，大寨人为此耗了不少心力，但自然规律不可违，油莎豆长得高一丛矮一丛的。见油莎豆如此长势，江青的脸一下子就拉长了：“你们怎么搞的？啊！我的希望变成泡影啦！我送给你们这么好的种子，你们却种成这个样子……”幸亏负责种植油莎豆的大寨大队科研组长高玉良确实对油莎豆的种植狠费了一番心思，他把这种作物不适合大寨生长，大寨人为此进行了怎样的实验和努力条分缕析得头头是道，江青才不再纠缠了。继而，江青又提出要去上次来时带人挖的防空壕。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那条防空壕纯属摆设，所以大寨人就给填了。此刻无法隐瞒，郭风莲只好对江青实话实说。这下子江青脾气上来了：“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来了吗？我是同修正主义斗争来了！你们毁我的战壕，也不向我打一个招呼……”

#### （八）召开学习批判会

一天下午，江青召集陈永贵、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队的干部，以及随同她的工作人员，一起学习中央（1976）4号文件。4号文件发布后，在“四人帮”的推动下，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国内兴起。江青在大寨召集的会议上，对邓小平大加诋毁，甚至把邓小平出国时带子女到机场给自己送行，也作为一条罪状。当时我也被召来参加学习批判会，江青说到这儿，点名要我为她的话做证。邓小平出国，我作为机场警卫负责人也在现场，可我没有印象邓小平带子女到机场，就照实说我没看见邓小平带子女到飞机场。江青见我不配合，有点懊丧，悻悻地说：“事情恐怕不像你说的那样吧？”

江青这次在大寨常放在嘴边的话题，就是关于“女人掌权”，她几次向大寨的社员、干部发问：“是随父姓还是随母姓？”当她得到的回答都是随父姓时，很不以为然地说：“你们为什么姓了父亲的姓而不姓母亲的姓呢？以后一定要改过来。”

#### （九）突然接到北京来电

9月5日晚上9时左右，我突然接到汪东兴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通知说要江青马上返回北京。汪东兴在电话中告诉我：“主席的病情很不好。”

关于回京的路线，汪东兴在电话里说：“你们返回北京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一是乘火车到太原，派飞机到太原接你们；一是乘火车到石家庄，派飞机在石家庄等，你看哪个合适？”我短暂的思考了一下说：“我看还是按后一个方案比较好。去太原时间太长，路也不顺。到石家庄换飞机对安全有利，又节约时间。”听了我的看法，汪东兴决定让我们走石家庄这条路线。

放下电话，我立即将汪东兴来电话的事报告了江青。没过多久，江青的秘书刘玉庭也接到了从另一渠道通知江青尽快返京的电话。江青听了电话传来的确切消息后，显得异常镇定，没有流露出一丝不安的神情，与大家心急火燎的心情形成很大反差。她依旧是那样慢条斯理地整理行装，用了很长时间才打点完毕。

我和随行人员同江青一起乘上汽车，从大寨到阳泉。在阳泉登上火车，于次日凌晨1时左右抵达石家庄。在一些记述此事的书籍和文章中，都说江青在返京的火车上还谈笑风生，甚至和同行的人员打扑克。但我的印象并非如此，江青没有打扑克，也没有谈笑风生。在石家庄火车站，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刘子厚、吕玉兰等已在那里迎候，他们陪着江青坐上轿车，直奔飞机场，飞机大约飞行了半个多小时，便到达北京。

#### ◇ 随卫江青到保定

##### （一）车厢漾起侃侃语流

1976年10月3日晚，江青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她外出警卫的我打了招呼：明天，即10月4日，江青要去试乘二七机车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牵引车头。二七机车车辆厂革命委员会的人也参加，让做好准备，并通知有关人员。

第二天一大早，江青和二七厂的10余人及中办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副政委狄福才，一起乘上内燃机火车头，挂了一节可以开会和会客的公务车厢，从北京始发到了保定附近。按江青的旨意，火车停在了于家庄的一条铁路专用线上，她睡了一觉。下午返京途中，休息后的江青来了精神，组织随行全体人员学习中央（1976）4号文件，车厢不时漾起侃侃语流。

##### （二）终于离开了车厢

我以警卫安全为由，未在车厢里听江青的说教。晚上七八点钟时，火车返到了北京站，可学习座谈会还没有结束，江青不仅自己不下车，还不许别人下车，我觉得很不正常，就借口安全问题下了车，并让警卫参谋马清泉一次又一次给汪东兴打电话，报告了五六次，请示怎么办？

汪东兴回答说：“知道了，她愿意什么时候下来，就什么时候下来吧。你们耐心等待。”一直等到10点左右，江青终于离开了车厢，回到她在中南海新落成的201住所。这是我一生

最后一次兼管江青，担任她的随卫。10月6日，也就是这次随卫后的第二天，江青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逮捕。

□ 《文史月刊》 2007年第1期

~~~~~

# 【一家之言】

梁效反对过周总理吗？

• 周一良 •

1974年1月25日江青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汤一介同志在会上宣讲所谓《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我补充讲解了其中的历史典故部分。不久，“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笔名梁效）成立，大约因为我被目为能够两个正确对待（“文革”和自己），我被北大党委由历史系调到梁效工作，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6年10月梁效成员接受政治审查，到1978年秋结束。如果对一般人而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而告一段落；那么，对我而言，这场大灾难又饶上了近两年的光阴才算结束。

梁效设支部书记一人，由迟群、谢静宜手下的八三四一部队的干部担任；副书记二人，北大清华各出一名。三十几名成员中，两校之外，还有少数人民大学的教师。成员除老教授晚间回家外，都集中食宿，每天三段时间都须到班。梁效纪律森严，不得随便请假，不得向外面（包括自己家人）透露工作内容。集中驻地在北大朗润园的北招待所，门禁森严，给外人以神秘莫测之感。梁效主要任务是写作，由中青年同志担任，为“四人帮”制造反动舆论。写作意图由迟谢两人下达，或由《红旗》、《人民日报》等报刊的编辑口头传达，有时甚至写成书面提纲交给各写作小组。几个写作组之外，有个研究组，后改名注释组，几名老教授在内。江青听毛主席谈话，遇到她不知的人物或不懂的典故，立即通过迟谢两人命令这个组查阅报告，起了供顾问咨询的作用。梁效还要求老教授对于写作组的文章在文献典故方面发挥所谓“把关”的用处。记得在1976年批邓公开化之前，支部书记布置写了一篇《论孔丘其人》，矛头所指已极为明显。支部书记意犹未尽，最后又加问一句：“能不能把孔老二描绘成身材矮小的人呢？”我立即指出，孔丘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决不能说矮小。这是记忆中在梁效所起的唯一一次“把关”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有人说此文是针对他而来，显然是为与“四人帮”划清界线，往自己脸上贴金。注释组的任务是对指定的诗词或文章作简明注解或译成白话，据说是供护士读给毛主席听时之用。注释组成员认为这项任务直接为毛主席服务，都兢兢业业，尽心竭力去从事这个工作。

在梁效工作期间，有一件值得提的发现。梁效成员曾被派到毛家湾林彪住宅，逐页检查他家里的书籍，以便发现他的亲笔批注之类，作为批判材料。我负责历史书籍。

林彪不学无术，未见任何批注，但我却有意外发现。《资治通鉴·魏纪》记载司马懿为了麻痹和欺骗他的政敌曹爽，和曹爽派来的人谈话时，故意假装脑子老糊涂，驴唇不对马嘴地打岔。喝粥时，有意随喝随从口中流出，沾满一身，表示体力衰颓。《隋纪》里记载隋炀帝杨广为了骗取其父文帝杨坚的信任，每当文帝到他宫里来，他总是把年少貌美的宫女隐藏起来，找一些老而且丑的出来侍候。乐器上也都积满灰尘，装成久未触动的样子，以显示自己不好声色，来博取父皇的欢心与信任。林彪在这两段文字上，都密密加以圈点。果然，司马懿计策得逞，政变

成功，曹爽受骗被杀。杨广骗得杨坚欢心，顺利登上了皇帝宝座。而吸取司马懿与杨广的“先进经验”的林彪，也“史无前例”地在共产党的党章中取得合法（？）接班人地位。我建议利用此材料写批判文章，可惜未被采纳。

江青曾几次来驻地与梁效成员见面，她去天津、小靳庄和山西大寨，也令梁效和梁效成员以外的某些教授随行。江青谈话浅薄无知，而喜欢自吹自擂，炫耀卖弄。她给我的印象并不佳，但她口口声声主席如何，因而给人感觉她是主席的代言人。我认为批林批孔也好，评法批儒也好，都是毛主席的部署，她只是执行者而已。由肯定法家从而承认中小地主有一定进步性，由研究法家著作而引起群众对古典文献的兴趣，这些倾向都与我的思想合拍，因而心安理得。

开始批林批孔之前，《北京日报》约我写一篇关于柳宗元《封建论》的文章。据说是毛主席欣赏此文，意在宣扬文中意旨，以防止大军区形成割据局面。当时流行一种据说有来头的说法，认为奴隶制社会必然分封，进步到封建社会才有郡县制。我以为这种观点与中外历史都不合，于是在文中征引史实，指出这个说法并无根据，意思是力求在“奉命”的文字中在学术方面多少注入点新意。到梁效大批判组以后，搞儒法斗争，我写了一篇《诸葛亮与法家路线》，登在《历史研究》。诸葛亮的思想中，儒家之外本兼有道家及法家成分，但此文配合甚嚣尘上的儒法斗争宣传，即使内容没有歪曲附会，客观上也构成“四人帮”反革命舆论组成部分，而我自己还以为是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效力。特别是梁效后期注释工作，有时任务急如星火，又须大家讨论定稿，每每深夜才能回家。我常常一边蹬自行车一边想，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不免欣然自得，忘却疲劳。后来《红旗》重新登载了我关于《封建论》的文章，我又当了党的十大代表。毛主席逝世，我列名治丧委员会，参加守灵。所以，直到“四人帮”被打倒，我作为梁效成员始终处于顺境。所幸者，我虽怡然自得，却未忘乎所以。审查梁效时，有人向一位同住燕东园、劳改大院的同屋，既是老革命又是老教授的同志了解我在梁效期间的劣迹表现，这位老同志的回答是：周一良进梁效以后与往日并无不同。这也许就是我接受政治审查后依然平静自若的原因。

1976年10月26日晚间，我与家人在王府井萃华楼吃饭，只听雅座一伙穿绿色军装的人边吃饭边欢呼叫嚷，当时并未在意。次日早晨到北招待所上班，门口已有解放军站岗，不能进去。原来“四人帮”倒台，一夜之间，梁效成员成了现行反革命。这个情况来得确是突然，却又像不那么突然。“四人帮”的罪行很快就大白于天下，我不需要什么思想斗争就投入运动，开始揭发批判。较之“文化革命”开始后相当长时期跟不上，大不相同了。梁效成员开始接受政治审查，全体集中到未名湖畔的宿舍和食堂吃住，老教授吃住回家，但也必须上午、下午、晚间三段时间报到。成员两三人编一组，每组负责人为学校的干部，辅以工厂工人。“四人帮”罪恶滔天，民愤太大，因而监督的人都以敌人对待梁效成员，往往疾言厉色，令人难以忍受。成员写材料，揭发，交代，大会小会相结合进行批判、审讯、斗争，全套作法与“文革”毫无不同，我说是“以‘四人帮’之道，还治梁效之身”。只有不搞喷气式和不挨拳打足踢，胜于“文革”。但这次政治审查来自官方，与红卫兵之为群众运动又不同，其压力之凶猛而强大，空气之紧张而令人窒息，远远在“文革”之上。

追查梁效的罪行之中，很突出的一条是紧跟“四人帮”，反对周总理。如揭发出江青说总理是大儒，批儒目标指向总理，等等。我在梁效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迟谢二人在任何会上暗示过。周总理逝世，梁效成员都很悲痛，不少人自动佩带白花。有两人在“四五”期间去了天安门，我是其中之一。注释组中后来查问，我当然如实报告。会后组长孙静告诉我“别紧张”，我当然也没认为犯了什么错误。审查期间，范达人和何芳川两个组的负责人分别找过我，严厉责成我老实交代他们两人反对周总理的罪行。我的回答是：两人都是历史系很好的学生，我认识他们快二十年了，敢保证他们不会反总理。



关于反总理还有一段值得提及的插曲。“四人帮”把孔子与林彪拉到一起，不仅举“克己复礼”等口号为例还想从生活上牵强比附，说林彪是儒家。其实林彪生活上倒确有一些怪癖。如他的衣服每件上都标有若干度的记号，他机械地按照加在一起保持多少度来穿衣，但这却与孔丘无关。大家知道，记述孔子生活的，主要为《论语·乡党》一篇。

因此，江青命令把《乡党》篇译成白话，供广大群众批判。这个任务当然落实到注释组。篇中讲到孔子在朝廷上的姿态，有一句“趋进，翼如也”，描写他向前急走的神情。几个人反复推敲捉摸，想不出恰当译法。魏建功老教授灵机一动，说“翼如也”指的是孔丘张开两臂，形如鸟之双翼。但直译“如鸟张翅”不太雅驯，不如说“端着两个胳膊向前急走”，更为传神。魏老说着站了起来，端起双臂，躬身向前快走了几步。大家连忙一致赞成他的说法，就这样定了稿。谁知“四人帮”倒台后，大量批判梁效影射史学的文章中，有人提出“端着两个胳膊”是影射周总理，对他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因为总理右臂受过伤，总是弯曲像端着。（据说是在延安时，江青骑的马惊了，把总理从马上撞下受伤）虽然总理只是端着右边一只胳膊，但批判文章对梁效欲加之罪，自然也就顾不得那些了。魏老当然多次被审讯，异常紧张。注释组的每个成员也都被提问。大家一致承认这句译文出自魏老，但都表示，他决无借此攻击总理之意。退一万步说，总理也不是端着“两个胳膊”呀！

政治审查自冬徂春，又经历了第二个冬春，迟迟未宣告结束，更谈不到处理结论。人们猜想此案大约经过多人，都感到棘手，在“四人帮”定案之前，无人敢负责宣布结束审查。北大党委虽对每个成员都很了解，也无能为力。“文革”中没吃过“劳改大院”苦头的中青年同志，未免禁受不住这样忽松忽紧、遥遥无期的审查，满腹冤屈，忧愁沮丧。每逢放风外出，我看见有的人在湖边抑郁徘徊，低头沉思，不禁怕他们走上二十年前我的好友丁则良冤沉湖底的老路。但我也爱莫能助。至于我自己，经过“文革”中狂风恶浪，加在头上的五顶大帽子都一一被事实摘掉。

我深信“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这两句传统谚语的真理。在审查过程中，无论如何威逼诈诱，我都处之泰然。虽然始终被目为“态度不好”，我决不作违心之谈，苟且过关。梁效接受的最大规模的批斗会，是在首都体育馆批判斗争迟群、谢静宜大会上陪斗。这座体育馆的主要设计者和建筑师，是我的九弟治良，我戏称他为老兄建造了“耻辱柱”和“审判台”。大会为体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一位来注释组不久的中国文学老教授成为从宽发落的典型，而一位写文章的主要笔杆子则从严发落，未经法庭审判，关进监狱达一年之久。梁效的审查到1978年秋间结束。又过了几年，我被告知不给任何党政处分，也不入档案。

打倒“四人帮”之初，社会上就流传不少关于梁效的谣言，如说北招待所地下室有江青进行刑讯之地，墙上血迹斑斑云云。十多年后，在美国遇见一位老教授。他80年代中期访问北大，住过北招，竟然还以此相询。还有关于我个人的谣传，说我是梁效头目。其实几名老教授主要是起装点门面以为号召作用，同时供顾问咨询。当时又盛传梁效驻地我屋内有保险柜，柜中藏有关于周总理的“黑材料”。解放军深夜进入北招后，在我屋内用枪对着我说：“现在交出保险柜钥匙，你还是人民内部，不交我就开枪！”其实我夜间不在北招住，屋内更无保险柜。据说这些话都出自北大历史系某人的大字报，一时流传颇广，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很多人知道。了解我的人断言不可能，也有人信以为真。“四人帮”倒台，万众欢腾，群情奋激，不少人形诸歌咏以表达鞭挞的心情。我展转读到文学研究所舒芜先生的《四皓新咏》，谴责梁效成员中的四名老教授——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为留此一段掌故，移录如下：

贞元三策记当年，又见西宫侍讲筵。  
莫信批儒反戈击，栖栖南子是心传。  
诗人盲目尔盲心，白首终惭鲁迅箴。

一卷《离骚》进天后，翻成一曲雨铃霖。  
射影含沙骂孔丘，谤书箠笞护奸谋。  
先生熟读隋唐史，本纪何曾记武周？  
进讲唐诗侍黛螺，北京重唱老情歌。  
义山未脱捋扯厄，拉入申韩更奈何！

□ 摘自《毕竟是书生》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